

格物觀的轉變 與清代考據方法

• 高 源

隨着西學東漸而產生東、西兩種文化的衝突和碰撞，為人們對雙方進行重新審視提供了一個切入點。當代一些學者試圖在中國歷史中，找到一個具有代表意義的橫斷面，從中尋求西方學術思想對中國學術的影響，尋求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發展的一致性，以彌補中國學術思想的斷層。明清之際的第一次西學東漸曾引起廣泛關注。當代一些學者認為，第一次西學東漸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術，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清代考據方法的產生。本世紀早些時候，梁啟超、蕭一山、徐宗澤等學者最先從西學東漸的角度來闡述明清之際學界空氣的轉變，認為明清學者普遍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以及清代考據方法的產生，皆為第一次西學東漸所致^①。胡適對以上觀點提出過異議，指出這一論斷缺乏充分的證據，在胡適看來，考據方法不必來自西洋，實係地道的國貨^②。但爭論的雙方敝而不論，並沒有在這一問題上做進一步的論證。而

當今大陸、港台的一些學者一方面沿襲了梁啟超、蕭一山和徐宗澤等人的觀點，同時進一步用現代邏輯語言解釋了考據的原則，將考據方法視為科學定理與假設的綜合利用^③。

西學輸入影響於我國傳統學術研究是不容質疑的，但明清學術內容的拓展是在甚麼樣的思想體系中進行的？考據方法的出現作為方法論上的一次創新，是西學影響所致還是中國傳統治學方法邏輯發展的結果，這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筆者在這裏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以供批評。

考據方法的出現作為方法論上的一次創新，是西學影響所致還是中國傳統治學方法邏輯發展的結果，這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格物觀的兩次轉變

筆者認為，清代考據方法是自宋明以來中國近世哲學方法論內在發展的結果，是格物觀兩次轉變所致，而非西方科學影響下的產物。自宋儒把《禮記》裏的〈大學〉提出來後，中國近

顧炎武倡導「經學即理學」，並視經學為儒學正宗，這種觀點刺激了考據方法的發展，段玉裁廣續了顧炎武和戴震對經學的主張，並提出「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的口訣。



世哲學才找到其方法論。所謂格物觀，即為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它探討如何窮究事物的原理以獲得知識。「格物致知」始見於《大學》，原是作為道德倫理修養的命題，在宋明以後的哲學裏，具有明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程、朱一派對此的解釋是④：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程、朱一派的方法論就是外求於物，通過「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積累，從一物之知而上升到對「理」的認識。至於他們所說的「物」，既包括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也包括心理現象和道德行為規範。此格物觀由於其所格之對象無所不包，十分繁雜，遭到後來陸、王一派的攻擊，使得格

物觀發生第一次轉變。

陸、王的方法論主張內求於心，將「物」限於心中之物、意中之物。他們認為照程、朱的方法，聖賢是做不得的，人無力去格盡天下之物，從而主張「心外無物」⑤：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陸、王的方法論體現了新的獨立精神，它極力提倡個人在認識上的自由，具有解放思想的一面，但其偏重主觀的格物觀，在後來心性之學充於世道的情況下，自然也遭到明清實學的反對，明清實學的出現導致格物觀發生第二次轉變。

明清之際倡導「經世致用」的學者批評陸王心學學而無實，其方法求之於心，也失之於心，導致空虛放曠的學風泛濫；同時批評程朱理學學而無用，並且不滿意於程朱支離破碎、失

之於外的格物方法，而主張格有用之物，把天下國家、日用之道納入格物活動之中，以實現其經世致用的抱負。

在明清之際的學者那裏，格物觀的核心已不再是程朱的「窮理」和陸王的「正心」，非為獨善其身，做一個脫離社會的隱士，而是要去正天下國家，把天下國家納入由自我價值自覺確立的格式之內。所格之物集中體現在身、家、國、天下、日用之道上。潘平格的格物說就十分明確^⑥：

物者，身、家、國、天下也。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渾然一事。……格者，通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

格物就是理解身、家、國、天下之間的相互關係，使之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因此，先致格物，後歸於治國平天下，這才是「經世」學者的目的所在。考據方法的開山之祖顧炎武主張「博學於文」，將自身以致天下國家皆列為所學之事^⑦：

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為。

根據他的一貫主張，格物應格「當務之為急」之物，既非「鳥獸草木」，也非「性與天道」，而是「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顧炎武在回顧自己學術思想之由來時說道^⑧：

崇貞乙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

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

十七世紀儒學這一方法論發展的新方向，為儒家經典研究和考證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因為對於天下國家、日用之道的理解必然要涉及儒家的經典。中國學術史上對經典的重視，漢代有漢武帝尊儒術、立學官、置博士之舉；唐朝倡明經、重科舉，士大夫漸返而求諸經訓；宋代理學興起，亦以六經為其依附，程朱更認為讀書為格物之功夫。自陸王心學興盛以後，高談性命學者輕視對典籍的研究，熱衷於空疏的心性之學，不切實用。清代學術的建立就是對此反動的結果。清初學者反明季空疏之弊，重新開始注重經訓，在這一點上與程朱一派的觀點相近。但格物觀的第二次轉變並非要回歸於程朱理學那裏，而是掙脫宋明理學的羈絆，以復古為解放，直接返之於古經之中尋求致用之學。儒學發展至此，考據方法的出現是很自然的。

考據方法的由來

宋代以前，儒、道、佛三教互不依附，自成一體。自宋以後，新儒學的興起則不能完全脫盡佛教的糾纏^⑨。在明清之際的學者看來，宋明以來有關孔孟之書已盡失其解，儒者或雜襲老釋之言，或以理學思想來注釋古經，後人往往受其蒙蔽而不自覺醒。在晚明的學術界中，為扭轉空談心性的迂腐風氣，就已出現了主張「通經學古」的經學倡導者，學者如楊慎、歸有光、焦竑、陳第等人明確提出，欲求聖人之道，必須求之於《六

明清之際的學者認為格物觀的核心已不再是程朱的「窮理」和陸王的「正心」，非為獨善其身，做一個脫離社會的隱士，而是要去正天下國家，把天下國家納入由自我價值自覺確立的格式之內。十七世紀儒學這一發展的新方向，為儒家經典研究和考證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

明清之際格物觀的第二次轉變為清代學術樹立了從古經中尋求先聖之道的思想路線。新的路線首先涉及的是語言研究方法的問題，即如何用當世語言去理解古代文字。

清代學者與宋儒的不同之處，在於治經方法之改良。宋代以來學者考古研經，往往以主觀方法擅改古書，而清學者則用更為客觀的方法以正其失，形成獨樹一幟的考據方法。

經》，而非像理學家那樣離經講道^⑩：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

在他們看來，宋儒以理學思想來注釋《六經》，使《六經》失去了本來面目，因此學者治經必求朱子以前的《六經》，必以漢儒為宗主。這明確表明，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已經在中國儒學的母體內開始孕育，為清初顧炎武倡導「經學即理學」開闢了道路。

顧炎武繼承並弘揚了晚明學者「通經學古」的新思想，但他並沒有走復興朱學以替代王學的老路，而是樹起「經學即理學」的旗幟^⑪：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

所以他主張回到傳統儒學中去，視經學為儒學正宗，號召人們去「務本原之學」。在顧炎武和其他學者共同倡導下，清代學術在治學方法上逐漸轉向博稽經史，形成了獨特的考經證史的考據方法。

明清之際格物觀的第二次轉變為清代學術樹立了從古經中尋求先聖之道的思想路線，而顧炎武為「通經學古」開啟了由音韻文字通諸子百家的方法論路線。新的路線首先涉及的是語言研究方法的問題，即如何用當世語言去理解古代文字。由於年代久遠，六經僅存其文，而其音失傳已

久，後人在對古文字難以理解的情況下，往往以當世之音改之^⑫。自唐明皇改《尚書》始，妄改古書已成風氣，明代好刻古書，改書之風尤盛。顧炎武因此而提倡由音韻文字通諸子百家的考據方法^⑬：

愚以為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通過音韻考釋古代文獻，恢復古書原貌，以實現「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⑭的價值理想。「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後來被乾嘉學派奉為治經的要訣，該學派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戴震對樸學路線的思想和方法作了概括總結^⑮：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志。

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則把顧、戴的思想錘煉成為「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的口訣。

可見，清代學者與宋儒的不同之處，在於治經方法之改良。宋代以來學者考古研經，往往以主觀方法擅改古書，而清學者則用更為客觀的方法以正其失，形成獨樹一幟的考據方法。

清代考據方法在開創時期，其特徵為辨偽、致用。代表人物顧炎武倡「經學即理學」，並確立由音韻文字通諸子百家的方法；閻若璩、胡渭通過辨偽以復古求真，從而開一代學風。乾嘉以後進入全盛時期，考據大師輩出，尤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為突出。全盛期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



中國社會和思想的發展演變，自有其內在的軌跡，不一定是西方影響的結果。

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等等。而「通經學古」亦漸由復宋之古發展到復漢唐之古、復西漢之古以致最終復先秦之古。也就在復古過程之中，清代學者的學術旨趣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最早確立的「明道」、「救世」、「致用」的思想路線，由於學術研究的深入以及清代政治氣候的變化，漸漸湮沒在為了考證而考證的純學術之中，學者以考證為治學的目的，絕少再談通經致用^⑥，但卻始終堅持由音韻文字通訓詁的方法論路線。而此時的考據之學已風靡一世，古籍整理的成果也已洋洋大觀。

從格物觀的演變到考據方法的產生，中國近世哲學方法論內在發展的線索十分清晰。儒學發展到明清之際，以經學經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開始在其體內孕育，考據學由此應運而生。試圖於儒學發展之外尋找個別外在因素（如第一次西學東漸，清初文字獄等）以解釋考據方法的由來，這

種努力往往忽視了中國學術思想演變的連續性。

梁、胡之爭與 唯科學主義的背景

本世紀之初，西方文明的東漸激發了中國思想界對科學的讚賞，科學被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唯科學主義的觀點十分流行。它有一種在與科學本身幾乎無關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學威望的傾向^⑦。

這種傾向也影響到了中國的史學研究。也許是為探討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發展的一致性，史學家們常常試圖用西方科學思想和方法來解釋儒學的發展，或乾脆將考據方法比附為西方的科學方法。在他們看來，這不但不與儒學的邏輯發展相矛盾，相反還更為深入地解釋了傳統的治學意趣。在考察明清之際第一次西學東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這一問題上，梁啟超等

人認為，西學東漸在當時鼓吹主觀冥想的思想界中引入了客觀的科學精神，使中國學問成為「科學式」，清朝一代學者由此而對曆算學發生興趣，甚至清代考據方法就係當時學者受西學影響所致^⑩。

梁啟超等人的觀點並沒有被胡適所認同，在他看來，當時還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論證考據學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帶來的。胡適在〈考證學方法之來歷〉一文中指出，清代考據方法並非西洋的舶來品，實係地道的國貨，是由宋代漸漸演變而來^⑪。他較早的一篇文章〈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對這一觀點作了一番論述^⑫：

程、朱的格物論注重「即物而窮其理」，是很有歸納的精神的。……那一方面，陸、王的學說主張真理即在心中，抬高個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標準來解脫「傳注」的束縛。這種自動的精神很可以補教程、朱一派的被動的格物法。程、朱的歸納手續，經過陸、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解放後的思想，重新又採取程、朱的歸納精神，重新經過一番「樸學」的訓練，於是有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出現，這又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

此段已勾劃出考據方法的產生與格物觀兩次轉變的關係。但是，在唯科學主義的思想背景之下，無論是胡適還是梁啟超等人並未重視清代考據方法由來的問題，也未就此展開進一步的論辯，而是均轉而討論這一方法與世界學術方法的一致性問題。胡適說的最為明白^⑬：

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格利賴

(Galileo)、牛頓 (Newton) 的方法，是一樣的……。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 (Darwin)、柏司德 (Pasteur) 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

胡適將考據方法視為科學方法，這與梁啟超、徐宗澤等人的觀點同出一轍，而且他還將考據的四大成績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訂學稱為「科學」，將幾個最有成績的人稱為「科學的學者」^⑭。他認為中國不是沒有科學的種子，中國除了有格物致知的科學目標外，還有三百年考證學的科學方法，所以當中國步入自然科學領域時還不至於完全感到陌生^⑮。

正是對中西學術發展一致性的探討，以及利用科學威望的唯科學主義傾向，使得考據學源於儒學母體之內的思想並未引起當世學者的足夠注意。徐宗澤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一書中，甚至於將西學東漸導致考據學出現這一胡適持有異議的論點，認為是胡適所支持的觀點^⑯。

如認為考據方法是受西方科學影響而形成的科學方法，則很難解釋這一「科學方法」與科學內容幾乎完全脫離的現象。梁啟超意識到了這一矛盾的存在：

清學之研究法，既近於「科學的」，則其趨向似宜向科學方向發展。今專用之於考古，除算學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學皆不發達，何也？

梁將此歸於我國數千年學術只重社會不重自然，胡適說是故紙的材料限死了科學的方法^⑰。但如認為考據方法來自第一次西學東漸，則這一矛盾很難得到解釋。

儒學發展到明清之際，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開始在其體內孕育，考據學由此應運而生。試圖於儒學發展之外尋找個別外在因素以解釋考據方法的由來，這種努力往往忽視了中國學術思想演變的連續性。

總之，清代考據方法是宋明以來中國近世哲學方法論邏輯發展的結果，是格物觀的兩次轉變所致，並非西方科學影響下的產物。如果忽視中國學術思想演變的連續性，試圖從西方科學發展的立場來尋找中國科學發展的線索，往往會得出相反的結論。

註釋

- ①⑩⑫ 參閱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84、100；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五篇（中華書局，1985），頁700；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49），頁8、289。
- ②⑬ 胡適：〈考證學方法之來歷〉，《華北日報》（1934年1月12、13日）。
- ③ 張蔭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二冊（正中書局，1979）；楊沛蓀：《中國邏輯思想史教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 ④ 朱熹注《大學》第五章。
- ⑤ 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答羅整庵少宰書》。
- ⑥ 潘平格：《求仁錄輯要·辨清學脈上》。
- ⑦ 顧炎武：《亭林文集·與人書二》。
- ⑧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 ⑨ 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八章）一書中詳細論述了新儒家的興起與禪宗的影響。
- ⑩ 歸有光：《歸震川先生全集·送何氏二子序》。
- ⑪ 顧炎武：《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
- ⑫ 由於聲韻的衍變，古經中的一些韻語，後世之人讀起來並不押韻，於是改經現象出現。唐玄宗開改經之舉，宋代朱熹也改過經。顧炎武認為他們改的並不對頭，顧在《音學五書》中的研究表明，中世紀齊、梁至唐、

宋，人們的讀字、發聲、調韻自成一體；而秦、漢、魏、晉也自成一體；而夏、商、周又自成一套。三套之間既有共同之處，也存在差異，請參閱趙儷生所著《顧亭林與王山史》（齊魯書社，1986），頁70。

⑬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答李子德書》。

⑭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與人書二十五》。

⑮ 戴震：《戴東原先生集·古經解鈎沉序》。

⑯ 清代文字獄的勃興並不能構成導致考據方法出現的原因，雖然在考據方法由來的問題上，文字獄說也很流行，但它對乾嘉學派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壓制學者們經世致用的政治理想，使得清代學術早期通經致用的觀念為全盛期為經學而治經學的思想所代替。

⑰ 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頁1。

⑱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遠東圖書公司）。

⑲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第三集卷二。

⑳ 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㉑ 胡適：〈編輯後記〉，《獨立評論》，86號。

㉒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頁24；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高源 陝西西安人，1965年生。199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學位，現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工作。曾發表〈從「東西異源」到「西學東源」〉、〈明清之際是否存在一次「科學啟蒙」〉等論文。目前主要從事中國「文革」期間科學體制的研究。